引　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为一方，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为核心，沿着和平与内战，团结与分裂，独立与卖国，民主与独裁这一条线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开展的。其一，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蒋介石政府军之间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也是主要的战线；其二，是主要由学生运动带头的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这是第二条战线，又叫第二战场。学生运动在总体上与解放战争的进程相协调、相配合，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战线。

这时期的学生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是第二条战线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第一阶段，从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到 1946 年 6 月内战全面爆发。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与民主，同时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这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向国内革命战争过渡的时期，是矛盾双方反复较量的时期。重大的学生运动包括：昆明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一二·一”运动；重庆学生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一·二五”运动；收复区学生反对“甄审”的斗争等。而国民党也策动了“二·二二”反苏游行和进行了其他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倒行逆施，从而形成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反复较量。第二阶段，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到 1947 年 6 月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在这一阶段,学生运动有两个高潮:一是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二是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的“五·二〇”运动。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斗争相结合,形成了国统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第三阶段,从 1947 年 6 月到 1948 年 8 月,解放军开始全面战略进攻。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也向纵深发展。浙江大学的“于子三事件”、大中学生的助学运动、南京学生包围青年部事件、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斗争等,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第四阶段,从 1948 年 8 月国民党对各地学生施行大逮捕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权走向彻底崩溃。学生运动一方面将已经暴露的进步力量输往解放区,借以保存实力,并为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准备干部,另一方面坚持在国统区的斗争,竭力护校,迎接解放,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

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相比,在历史上各有各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相对来说,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规模空前扩大了,斗争水平提高了,经验更加丰富了;而且与解放战争密切配合,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为目的,其广泛性、尖锐性、复杂性是历次学生运动所没有的。这就是这个时期学生运动的重要特点。

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珍贵的经验,值得永载史册。

南京学生运动以中央大学为主力,中央大学 1946 年 5 月从重庆迁回南京,它在重庆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第一阶段。

重庆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和南京的学生运动，有发展和传承的关系，所以写南京学生运动，先应回顾重庆时期中央大学学生运动的光荣历史和有益的经验。

第一章
力量积聚从重庆开始

1946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分别从重庆、成都迁回南京，与原在南京的大学合并，两地学生中的进步力量汇合起来了，他们团结着5000多名同学，成为南京学生运动的排头兵，坚强的民主堡垒。回迁之前，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在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的总趋势是，进步力量从弱到强，反动力量从强到弱。这两种力量的消长,经历了反复较量,是一个尖锐、复杂、曲折的过程。经过斗争，在学生中锻炼出了一支骨干力量，他们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许多进步社团涌现出来，聚集起众多的同学，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广大同学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迅速提高，成为学生运动的广泛基础；同时，锻炼出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有斗争经验的群众领袖，成为学生运动的公开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是40年代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引导下，由点点滴滴、涓涓细流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支队伍。没有这支队伍，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学生运动的高潮迭起是很难的。由于中央大学是全国著名的大学，学生人数多,影响大,又地处京畿,所以,重庆和南京的许多学生运动都从中央大学发起，带动全市，并影响着全国。

话历史先明时势　记学运简介学府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地方。中华民族两种命运的斗争在这里展开。

20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侵华策略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把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偏安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的诱降,也出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的恐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41 年 1 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举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遭到破坏。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对外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决定停止在蒋管区发展党员,已经暴露的党员都要撤离、隐蔽。一些在各地求学的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他们和他们所联系的进步青年开始了流浪生活。他们向往延安，却被国民党封锁了通往红都的道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逃过特务的追踪,辗转汇集到重庆、成都、昆明等高等学校集中的城市,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探求革命的道路。

重庆,这里有“红岩”(南方局所在地),有《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总部。因此，许多进步青年是冲着他们来的。中央大学就是战时青年聚集的重点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人在中学时期就接受了地下党的启蒙。但是，更多的青年是怀着各种各样的希望来到重庆的。他们的处境和遭遇也是各不相同的。

大批沦陷区的青年,不愿做日本占领下的奴隶,他们失去了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乡和亲人,流离失所。他们从东北、华北、中原、华南,辗转来到重庆。他们是饥寒交迫的一群，他们要活命，要生存，有强烈的抗日救亡情愫。

一批批喜欢文学的青年走进这里的高等学府。他们从中国文学大师鲁迅、茅盾、巴金、曹禺……和外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巴尔扎克……的名著中吸取了营养，从艺术的宫殿走进社会科学的宫殿。

来到重庆的学子们，从童年时代就痛感国家羸弱，蒙受着列强欺凌的耻辱。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类的宏志。他们爱祖国，要救国。他们是寻求救国之路的一群。在他们面前，路在哪里还不免有些朦胧。

四川省及其邻近地区，也有许多学子考人中央大学，当时占学生人数的大半。其中大多数人是为了就近读书，寻求个人出路，但也有一部分人怀着爱国报国的理想，读过一些进步书籍，追求真理和正义，对共产党抱有一定希望，对流亡同学怀有深刻的同情。他们和沦陷区来的同学友好相处，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一起进步。

汇集在重庆高等学府里的战区学生，绝大多数是穷学生，穷得一无所有；甚至是打着赤脚，一路讨饭而来的。但是就整个学校来说，这里也有国民党高官的子女，大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子女。他们不愁吃穿，不愁前程。但是，其中也出现了叛逆的一群：因为他们太了解他们的父兄，或痛恶其腐败，或不堪封建大家族的压迫，跟着进步的一群走了,他们要追求光明,寻找正义、自由。

有相当多的青年学生，不同程度地处在浑沌状态之中，正统思想有很大的市场。不少人还把蒋介石当做抗日的英雄，救国的希望。

国立中央大学的校本部在重庆的沙坪坝。一年级分校在柏溪,医学院、畜牧兽医系在成都。这个号称全国‘ 最高学府 ’的中央大学，有着在当时最齐全的院系设置，有着斐声国内外的学者专家

执教。可是，正因为她地居京畿之要，学府之首，国民党政府就予以特殊的重视。校园里反动党团力量强大，控制很严：这里有以教务长何义均为首的国民党党部和三青团团部；有以朱丕生为首的中统特务；以邓登级为首的军统特务。邓登级是国防部宪兵少校，带着手枪和勤务兵当“学生”，按月到国防部领薪水。他是个独臂，人称“断臂将军”，是有名的职业学生。在学生中还有国民党各个派系安插在这里的亲信，各军事机关、各地方势力保送来校进修的骨干。学生会被他们控制着，许多社团也被他们控制着。“皖南事变’以来,校园里政治‘低气压’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聚集在这里的失去关系的党员、保持着单线联系的党员、在中学时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年，都在自觉地辛勤地耕耘着。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在感情上、生活上、学习上和同学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三五成群，没有明显的组织形式，不动声色地传播着进步思想，团结着周围的青年。他们像点点星火，默默地燃烧着。

一边是政治的低气压，一边是地火在奔突，这就是重庆中央大学所处的小环境。

形势变统一组织“新青社”光荣诞生

在红岩,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及其青年组(刘光是负责人),无时不在牵挂着青年学生。一些失掉组织关系的年轻党员找来了，一些倾向进步的学生找来了；他们总想建立严密的组织。刘光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说,现在大环境不许可,可以考虑不制定章程,不规定纲领,在志同道合的友谊基础上形成不拘形式的小组，每个小组人数不多就无妨。周恩来给这种形式起了个名字叫“据点”。

董必武一段颇为形象的谈话，令人顿开茅塞。他对来红岩的中大同学说：以严密的组织对付国民党严密的特务组织，是硬碰硬，他们当权、强大，我们无权、弱小，碰起来我们必然受伤。现在我们采取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个人友谊联系方式，好像棉花一样，反动派要打我们，就像铁铊打棉花，打也打不伤。而我们可以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一样，能够自由活动。每个进步青年联系三五个人，这三五个人每人再各自联系三五个人……这样，便能逐渐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南方局青年组的同志还对中大同学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在升级，国民党特务对进步青年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要求他们善于隐蔽，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以分散的个别联系方式交朋友，在朋友中间传播真理，学习时事、理论。好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一些进步书刊在校园里还能看到。这就是被称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 16 字方针的具体作法。

1942 年，中大刘明章等几个进步青年按照南方局的方针在中大建立了第一个据点。他们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就建立了一个"核心"。一两个月核心成员到红岩和青年组会面，研究工作，并在红岩村那座灰楼上学习文件，讨论时局形势。他们回学校时，又带回《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不能登载的文章、小册子。于是，一条无形的红线把红岩和沙坪坝连接了起来：红岩——据点核心——据点成员——倾向进步的同学——众多的青年朋友。要求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寻找救国之路的学子，倾心于文学作品的，不满现实的，苦苦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不同起点的同学，渐渐地，直接或间接地，同这根红线连接了起来。到 1944 年冬，据点成员已有 100 多人。

1944 年 11 月，日军攻占湘西、桂北之后，占领贵州独山、进逼都匀，四川告急，重庆人心惶惶。蒋介石以抗日为名，趁机号召 10

万青年从军，积蓄反共军力。招募青年军这件大事，交由特务头子康泽负责。中大不少热血青年出于抗日爱国热情，报名参加青年军。

中大一些进步同学，眼看报名参军同学有落入陷阱之虞，非常着急。罗炳权、陈宏万、柯在烁、曾庆冠(曾卓)、潘志新、任彝玺(任建树)、张华棠(张树人)、张镜清等人，四出串联，交换意见，研究对策。他们希望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引导同学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而不要参加国民党的青年军。为此，他们决定，发起建立“中央大学学生抗日救亡会”(简称“救亡会”)。

12月2日下午，他们集合了几十个人，在松林坡西南角的一间小教室里，开了一次预备会。群情激愤，讨论热烈。他们认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是为政治服务的；挽救国家当前危机的关键，在于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建立“救亡会”，任务是向民众宣传全民抗战，到战地做救护工作，慰问伤病员等等。他们决定，“救亡会”成立大会于12月3日下午在101大教室举行；推举陈宏万担任大会主席，由曾庆冠负责起草“大会宣言”。他们拟定了宣言和标语的基本框架，会后大家分头去写。

天已经黑了，热情迸发的学生投入了忘我的工作，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天一亮，一大批标语贴满了松林坡校园：“欢迎同学们参加救亡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改革政治”、“惩办汉奸”，等等。最引人瞩目的是矗立在通向松林坡路口的一副大标语：“沙坪坝，你站起来！”

“据点”成员黄志达参加了预备会。他感到这种作法不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过于暴露自己，容易遭受打击迫害。他连忙找到“据点”核心成员刘宪贞(刘晴波)，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宪贞同意黄的看法，说：“要设法让他们停下来。”他连夜找与罗炳权、潘志新关系密切的同学，进行劝阻。

3日上午，“据点”负责人吴佩纶再也坐不住了。好多朋友到

教室找他谈“救亡会”的问题。情况紧急，吴佩纶不得不召开据点核心组会议（这样的会还从来没有开过），会议在核心组成员仓孝和使用的化学实验室里秘密召开。核心组一致的意见是，参加“救亡会”的有 40 多位同学，他们是真诚爱国者，是有觉悟的一群，是党的宝贵力量，不能让他们遭受打击、受到损失，必须设法劝止。

刘宪贞立即到红岩去找青年组的朱语今。朱的意见也是劝止。待刘宪贞回到沙坪坝，已是午后，一切都迟了，劝阻“救亡会”的积极分子的工作已来不及了。他们说，开会的通告已经贴出去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与会的同学们已经陆续进了 101 教室。不明真相的身着新军装的青年军成群结队而来，与校内的三青团分子纠结在一起，气势汹汹，包围了会场。陈宏万沉住气，宣布开会。第一个议程是宣读《救亡会成立宣言》。刚读到“当日寇逼近贵阳之际……”，包围在教室外面的青年军和破坏分子就吼了起来：“你造谣！谁说贵阳失守了？”他们是故意把“逼近”当做了“逼进”，还是根本没有听清楚，反正他们要挑衅，要捣乱。说着，那些破坏分子嘴里骂骂咧咧，冲进了会场，把陈宏万包围起来，推推搡搡。只听一声喊“打他这个龟儿子”，暴徒们动起手来，叫骂声、争辩声、桌椅碰撞声，会场一片混乱。

潘志新站在凳子上高喊：“这是学校，尊重秩序，不要打人！”几十个暴徒围上来攻他，他临危不惧，同暴徒们进行舌战。身材魁梧的任健从后排几个箭步冲向主席台，把陈宏万抢了出来。暴徒们就转而围攻任健。任健冲出包围，逃出会场，在松林坡的环形路上飞奔。暴徒们穷追不舍，终于抓住了任健。陈宏万被他们捆绑起来，肆意殴打。他和任健、潘志新三人都被关了起来。“救亡会”就在反动分子演出的这场“全武行”闹剧中夭折了。本来就沉闷的沙坪坝，又被蒙上了浓重的肃杀之气。一些进步同学为了提防不测，暂时隐蔽。

下一步怎么办？如何营救被关禁的同学？罗炳权心急如焚。他这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第一个想法是找党组织。他不知道在中大有个“据点”，就去找他和陈宏万在中学时就认识的党员陈汉欣，当时陈在重庆工作。经陈汉欣介绍，罗炳权到《新华日报》职工宿舍见到朱语今，向他报告了成立“救亡会”和被破坏的情况。朱语今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这个时候搞这样的活动是不妥当的。但是，群众既然已经起来了，就得支持。同学被抓起来了，要设法营救。”又说：“营救之事，可以找些社会名流，争取社会声援。”

罗炳权这次见到朱语今，就像重见久别的亲人一样，非常激动，虽然没有正式接上党的关系，但是他已经把自己的情况向党组织讲了，心里踏实了许多。

罗炳权当天回到沙坪坝时，三位被抓的同学已被释放。过了几天，陈宏万、潘志新、任健被学校开除。陈宏万去昆明教书，任健和其他同学一道，经南方局的介绍前往中原军区。潘志新打算回家乡苏北。鉴于当时的形势，一些同学不得不先后离校。柯在烁在事件过程中，曾与陈宏万一起找过国民党党团负责人何义均和教育长顾毓琇，政治面貌比较暴露，也就成为三青团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他在中大呆不下去，转学到西南联大。

在学生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公开组织“救亡会”，号召同学参加，客观形势不允许。号召同学走“救亡会”指出的路，到敌人后方去，与当局号召青年从军针锋相对，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救亡会”揭露国民党的分裂、倒退、投降政策，政治性十分强烈，严重脱离当时青年学生的认识程度。这就是“救亡会”失败的原因。然而，“救亡会”事件不仅揭露了国民党招募青年从军的政治骗局，而且标志着国难当头，青年学生的觉悟有了提高，他们在思索、在探求，渴望组织起来。“救亡会”也打破了中央大学自“皖南事变”以来校园里长期的沉闷和积郁。更直接的是，它促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的诞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大‘据点’成员们从‘救亡会’事件中得到一个共识:进步力量没有统一的组织,行动步调不一致,导致了失败。吴佩纶特别感觉到:‘据点’这种形式太分散,遇到紧急情况,要把意见一个一个人地传下去,再一层一层地把意见反馈上来,事情已经发生变化。这次,明知发起‘救亡会’不妥,要避免损失,取消这次集会,却已来不及。校内的进步力量意见不统一,各行其是,而‘据点’却无法把大家统一起来。

“据点”从‘皖南事变’以来,在聚集进步力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形势发展了,变化了,那种缺少严密组织的松散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需要。而且,众多进步同学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的组织:‘据点’却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刘光同意强化‘据点’的组织,首先把分散联系的‘据点’核心成员组成一个真正的核心组,作为‘据点’的领导机构。核心组定期开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讨论和决定重要事项。在核心组的指导下,以院系和工作关系编成的小组为基础,把原先松散的不定形的联系,转化成比较严密的有形的秘密组织。实际上,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雏形,只不过还没有定名。

1944 年 12 月,朱语今到成都去了解‘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情况。原来,在成都华西坝,内迁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畜牧兽医系、齐鲁大学和当地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院校中,已经有了不少进步分子组织的社团,并在这些社团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青年协会”。而且,就在这年 10 月,在华西坝举行了轰动大后方的“国事座谈会”。11 月,又发生了成都市中学生因罢课招致军警镇压的事件,“民协”组织了成都全市大中学校的声援和抗议运动。朱语今回到红岩,向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汇报。朱认为成都学校里已经建立了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重庆各大学条件已经成熟,也应建立同样性质的组织。王若飞同意这个意见,青年组就开始在重

庆‘据点’成员较多的大学里,着手在‘据点’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性质的组织,中大的组织取名‘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原来‘据点’的核心小组,就成为新青社的领导小组。在青年工人的“据点”和职业青年‘据点’所在单位里,也建立类似的组织。

朱语今当即通知中大核心组,起草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章程。起草的任务落在黄可和刘宪贞身上。他们参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用蝇头小楷写出了初稿,在‘据点’成员中分头征求意见,经过字斟句酌的修改,最后由南方局青年组确定下来。章程规定:新青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规定了社员的权利和义务,社员须参加本社一定的工作和活动,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等。参加新青社的条件是承认本社章程,由一二名社员介绍,经过考查了解,由领导小组分管组织工作的人批准。

1945 年初,吴佩纶召集核心组成员黄可、刘宪贞、黄志达等人开会,在小龙坎成立了第一个领导小组。会后,吴佩纶和黄志达一道去柏溪,委托一年级的穆广仁和翁礼巽负责在分校建立组织。但是,当时因为还没有经南方局的正式批准,新青社的名字没有下达到每个成员。直到这年 8月,南方局正式批准了新青社的建立,社员才明确自己参加的组织是新青社。由于吴佩纶等人毕业,已调至南方局青年组协助工作,没有再参加新青社领导小组。他在松林坡的化工系教室召开了经批准后的新青社领导小组会议,并明确了分工。他们是:黄可、刘宪贞(负责全面工作)罗炳权、胡甫臣(组织工作)穆广仁、童式一(宣传工作,童主要负责《大学新闻》的工作)任彝玺(统战工作)翁礼巽(调研工作)。

新青社建立后不久,于 1946 年 12 月成立了中央大学民主同盟组织,成员有 20 人。其领导人为笪绍麒、任彝玺(新青社员)、帅能应。参加民盟的多是抗战时期深受颠沛流离之苦,怀有报国之志,政治觉悟较高的同学。中大民盟组织属民盟中央总部直接领导,与地方上的民盟组织不发生横向关系。在校内民盟和新青社

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斗争需反复较量　进退宜智勇双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终于胜利了。人民多么希望享受和平，建立一个民主团结的政府，改变满目疮夷的祖国啊！可是，抗日战争的硝烟未散，内战危机四伏。蒋介石把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共武装力量，视为不共戴天之敌，必欲消灭之而后快。只是蒋介石要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还需要时间准备，需要美国政府的援助。把美械装备起来的几十个师的中央军从大后方运送到前线去，抢占战略要地，亦非短时期可以办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十天内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蒋介石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谈判，果真如此，就可以把拒绝谈判、破坏团结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共产党头上。不料，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的陪同下，于8月28日飞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然而，蒋介石一面和毛泽东谈判，一面又指使阎锡山调集13个师的兵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古属上党郡)大举进犯。解放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痛击来犯之敌，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蒋介石这才被迫于10月10日和毛泽东签订了《双十协议》，并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重庆各大学的学生们，以他们特有的政治敏感，首先发表了《致全国同学公开信》和《致美国学生书》，呼吁全国学生采取有效行动制止内战，要求美军退出中国。11月18日，成都各大学21个团体联合发表《制止内战宣言》。11月25日晚，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但是，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呼吁采取镇

压政策，血案在昆明发生了。

1945年12月1日，是个黑暗的日子。当日上午11时,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百余人，伙同大批便衣特务，分成若干组，同时袭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新宿舍、联大师院、工学院、联大附中等校。军警冲入联大新宿舍，以木棍铁锄等凶器殴伤同学，重伤10余人,又扔手榴弹1枚，重伤南菁中学教师于再，于再于当晚逝世。在联大师院又掷手榴弹3枚,当场炸死联大同学李鲁连,重伤女同学潘琰，以及闻声前来支援的昆明工学院同学张华昌等10余人，其他人也遭到军警刺刀、石块的袭击。潘琰、张华昌当晚因伤重逝世。这就是“一二·一”惨案。事件中共牺牲4人,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青年何罪？爱国何罪？国法何在？公理何在？声势浩大的声援昆明学生的浪潮，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学生运动，席卷全国。中大同学愤怒了。松林坡的民主墙上贴满了抗议暴行、要求惩凶、声援慰问昆明同学的大字报。《大学新闻》报社外,张贴出西南联大寄来的小报,同学们了解到“一二·一”惨案的真相。可恨的是，学生自治会为三青团分子把持，他们拒绝声援，按兵不动。同学们看清了这帮人的反动嘴脸，就改用联名写慰问信的方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新青社领导核心深感，不掌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就没有合法斗争的主动权。在没有掌握学生自治会领导权之前，成立进步壁报社为主的壁报社团联合会，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太公报》、《求真》剪报社、《野马》漫画社、《青果》、《星火》、《生活》、《杂拌儿》、《消炎片》、《正风报》、《天声报》等一大批壁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把整个松林坡团团围了起来。

“壁报联合会筹备会”召开成立大会的布告贴出来了。这下子惊动了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他们决不容许“壁联”出现在松林坡。于是，一天之内突然贴出了一些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壁报：《兽中

王》、《天公报》……成立大会刚刚开始，一些打手就以这些壁报代表的名义闯进了会场，大打出手。“壁报联合会”流产了，在进步同学倡议下，却又成立了“壁报联谊会”。“壁联”的流产，使许多同学见识了反动分子和特务们的嘴脸，也使沙坪坝校园里关心国事的政治热情增温。

1946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会议将决定战后中国的命运。举国上下，都盼望着会议取得成功，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0 天过去了，谈判仍处于僵持之中。沙坪坝的校园里、宿舍里关心国事的学生们议论纷纷，民主墙上贴出了许多大字报。

不久，中大民主墙上又出现了一大批大字报，抗议英国在九龙屏山修建机场，抗议法国轮船“白尔丁”号暗中载走本应交我国审判的法奸。这两件事被称为“屏山机场事件”和“白尔丁号事件”。大字报号召就这两件事举行抗议英法的游行示威。

新青社的领导骨干们分析了形势。他们了解到，这次游行的动议是国民党、三青团发动的。国民党中宣部和三青团中央团部发出指示，要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他们的目的，一是转移群众对国内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视线；二是挑起国际纠纷，从英法扩大到苏联，制造反苏反共事件。不管怎样，他们打的是爱国主义的旗号。新青社决定采取赞成游行，但要把游行的主要目标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的对策。宣传内政不修，则外交无力；自己不争气，则外侮频来。一天之内，新青社员和进步同学在民主墙上贴出了颇有声势的大字报，举出强有力的论据，要求将反对英法的示威和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游行合并举行。进步教授杨晦、吴组缃等也为此向同学们发表谈话。

国民党、三青团感到有人在同他们“捣乱”，于是，指使人到校园里抄主张“合并举行游行”的大字报上的学号（即署名，根据学号可以查出同学的名字），企图加害他们。不料，那些人正在抄学号时，被同学们发现，大家围上来同他们论理，吵了起来。愤怒的同

学们把三个抄学号的狠揍了一顿,并在大礼堂里公审他们,大长了进步学生的志气。

三青团分子遭到了挫折,被国民党当局召到重庆市区开会,决定阻挠游行,并放风说中大有‘异党’活动。学生自治会的首领谷崇实,迟迟不召开系科代表大会,新青社的领导从这场争论中既看清了反动派破坏游行的企图,也看清了群众要求召开系科代表大会的强烈情绪。决定,发动系科代表联合签名,要求召开系科代表大会。并争取在大会上通过游行的决议,从而粉碎反动分子破坏游行的阴谋。经过努力,在众多同学的监督下,绝大多数系科代表签了名,系科代表大会召开了。

系科代表中的多数属中间状态,进步的和反动的都是少数。但是,要求政协取得成功,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是包括中间态度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的心愿。会前,一些反动的系科代表在改选声中被撤换,力量对比开始向进步方面倾斜。因此,这天晚上的系科代表大会,代表们到得很齐,旁听的同学有 2000 多人,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会上许多代表主张以内政为主题,即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必须成功不许失败。而反动代表坚持游行只能对外,招得旁听席上一片嘘声。最后举手表决,以 96 票对 8 票通过 1 月 25 日游行,对内对外合并举行。会上选出了游行委员会,下设宣传、组织、纠察、文书(起草文电)、交际等 9 个组。

大会通过游行决议是第一个胜利,接着,大会讨论游行的口号,争论异常激烈。“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彻底执行停战命令”“和平建国”等这类口号,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就通过了。唯‘立即严惩汉奸’‘严惩贪污’‘反对官僚资本’这类口号,也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可是,当讨论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口号时,进步方面强调前者,反动方面坚持后者,双方僵持不下。这两个口号正是政治协商会议上国共双方争论的焦点。会议已经开到深夜,眼看游行因这个口号的争论,有陷于流产的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